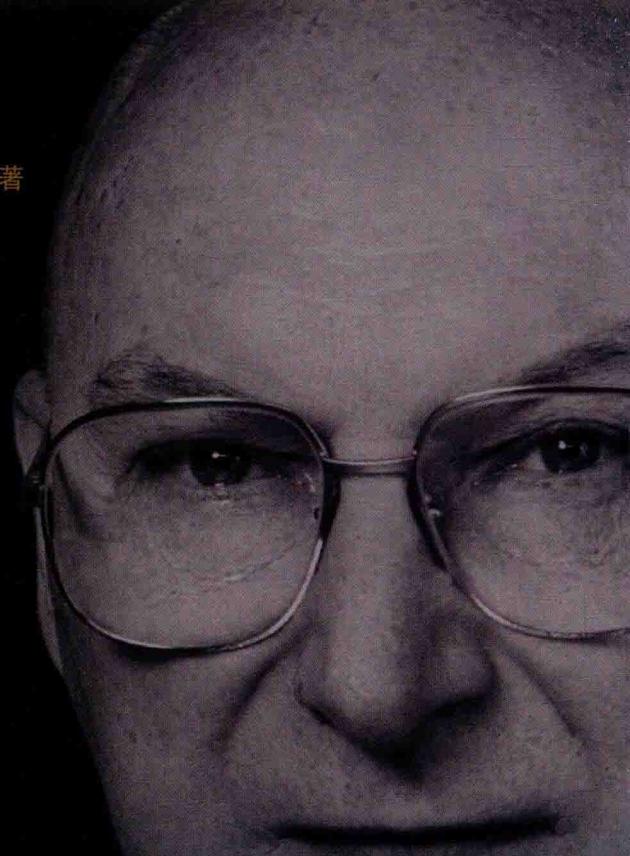




CISAP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

〔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美〕巴里·沃茨◎著

张 露 王迎晖◎译



THE LAST WARRIOR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世界大战出版社

最后的武士

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

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美]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著
[美] 巴里·沃茨

张 露 王迎晖◎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字：01-2015-4661

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by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Barry D. Watts

Copyright©2015 by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Barry D. Watts

Foreword copyright © 2015 by Robert M.Gat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 /

(美)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美) 巴里·沃茨著；张露, 王迎晖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12

书名原文: 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ISBN 978-7-5012-5649-5

I . ①最… II . ①安… ②巴… ③张… ④王… III . ①安德鲁·马歇尔一生平事迹 IV .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5304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YYLWW

书 名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

Zuihou de Wushi: Andrew Marshall Yu Meiguo Xiandai Guofang Zhanlue de Xingcheng

作 者

[美]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巴里·沃茨

译 者

张 露 王迎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1000毫米 1/16 22印张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649-5

定 价

7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编：梁守德 王缉思

执行主编：于铁军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缉思 王校轩 刘 华 李 晨

张 煜 张海滨 范士明 唐士其 袁路明

梁守德 徐弃郁 梅 然 寒天阳 董子峰

温金蓉 欧阳维

丛书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写下了这段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与战略研究是世界军事与战略研究中的璀璨明珠。现代军事战略发端于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在国际史学界，19世纪中叶以来的军事与战争史被定义为近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近现代军事史与战争史与现实距离最近，其所能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现实，而且将会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近现代的军事与战争实践经验是丰富的，也诞生了毛泽东等战略大师，其“人民战争”与“游击战”理论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中国国界。

同时，中国的现代战争与战略研究，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战争与战略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并且相对缺乏机械化、海战和空战等现代战争经验。与古代战争和战略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军事史与战争史是现代战略研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拿破仑战争的实践催生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通过梳理近现代的海战史，马汉总结出“海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又推动各国战略理论家对于“空权”“间接战略”“坦克战”“大纵深战役”等问题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因为投入相对有限，中国学界对于近现代战争史的研究，虽然通过军内和地方学者的努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战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但还是缺乏深度和广度，不仅中国自身的战争经验尚未得到深刻的总结和有效的利用，而且对于自身所缺乏的国外战争经验的借鉴也相当有限。

国外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对于军事与战争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军民融合与综合研究的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909年，牛津大学就已经设立了战争史讲席教授。首任讲席教授斯宾塞·维金森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既然牛津大学的学生是未来的治国人才，那就有必要让他们了解和掌握军事和战略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开展对于军事史，尤其是近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教学。除了学界外，国外军界对于地方学者参与军事历史研究一直十分支持。在19世纪末期，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就聘请多名海军史学家前往任教，英国海军史学家和海军战略家科贝特甚至参与了一战前英国海军对德作战计划的制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美国军方也邀请了诸多历史学家参与了其官方战史、情报史的编撰，以及很多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的研究课题。除了军界和学界的努力建之外，发达国家很多民间的研究者，凭着兴趣与热情，利用开放的历史档案，撰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军事历史著作，不仅填补了很多研究空白，而且增进了公众对于军事历史的真实了解。因此，国外军事史研究呈现出军界、学界与民间共同携手，宏观、中层、微观研究与普及教育打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军事战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自古知兵非好战”。要想更好地维持和平，必须更深入地研究战争与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立足北京大学这一综合性大学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旨在以军民融合的方式，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为中国的战争与战略研究夯实基础。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希望凭借这一平台在两个方面聊尽绵薄之力：一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军事史以及战争与战略研究的优秀成果，二是努力推介国内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外战争与战略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期盼学术界同行、同好共襄此举。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选择译著与论著的依据是其在战争与战略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并不表示编委会

和出版社赞成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

最后，衷心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丛书的作者和译者对于我们的鼎力支持。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3年10月

致敬
安德鲁·马歇尔
同时缅怀
詹姆斯·施莱辛格
净评估之父

序

ix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位杰出、但默默无闻的90多岁老人的生活，这个人是安德鲁·马歇尔。从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开始，他曾为每一任国防部长效力。本书的两位作者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巴里·沃茨（Barry Watts）来讲述马歇尔的故事是完全胜任的。他们两位与马歇尔认识并共事了30多年；克雷佩尼维奇还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防务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任职。

作者称本书为马歇尔的思想传记。的确是这样，但是不仅于此。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来观察冷战的历史，以及柏林墙倒塌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

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克雷佩尼维奇和沃茨向我们介绍了马歇尔在机构理论方面的奠基之作，这对我们后来理解苏联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发挥了深远影响。他的影响力在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的《珍珠港：警告与决策》（*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以及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两本书中都得以体现。这些著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情报的作用、如何看待我们获得攻击早期预警的能力以及形成有效威慑的能力。两位作者都认为马歇尔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灵感。

20世纪60年代，在兰德公司工作的第二个十年中，马歇尔开始努力解决系统分析的有限性，同时寻求新的途径，使美国在与苏联的长期竞争

中制定出更好的战略。其结果是被称作“净评估”的分析方法。仅仅几年之后，就在五角大楼建立了净评估办公室，由马歇尔担任办公室主任。

净评估办公室的宗旨，是要对战略意义重大的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

正是履行了这样的宗旨，净评估办公室在其41年的履职（也是马歇尔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在寻找并确定防务高层领导所需关注的挑战和机会。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预计苏联的防务支出对其经济的负担为6%到7%。而马歇尔对苏联防务负担的独立评估促使中央情报局将这一数字翻了一倍。这还促使我们重新考虑美国在冷战中的长期竞争态势。它还说服了一些关键的高层领导人，苏联人将很难在长时期内维持如此高水平的军事开支。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时间在我们一边。十年之后，马歇尔被证明是正确的。

后来，马歇尔开发了“竞争性”战略（也被称作“强加成本”战略），也就是对美国的敌人强加不相称的成本代价。该战略有助于抵消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防务预算的削减。这个理念比较简单，但相当深刻。马歇尔认为，不需要不断想办法去应对苏联威胁，而应该寻找机会削弱他们军事投入的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末，马歇尔开始研究苏联军队对潜艇的巨大投入，当时他建议我们要利用在静音技术和水下传感器方面的优势，避免我方潜艇被探测到，同时加强我方探测苏联潜艇的能力。在卡特政府刚刚取消B-1轰炸机项目之后，马歇尔敦促当时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要“继续研制轰炸机”，当时苏联人已经无法对我们的核导弹力量进行有效防御。马歇尔却指出，事实的确如此，但要从全局看这个问题。他认为，苏联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柏林墙事件和击落韩国飞机的事件说明，苏联政权决心控制自己的领土。为此他们部署了大量防空力量，主要是用来防御美国的轰炸机力量。马歇尔指出，维持这支（轰炸机）力量，美国就能够刺激苏联人维持其先进的防空体系，并对其进行现代化升级。而这样的话就会使他们花费比我们B-2隐身轰炸机项目更多的钱。到了8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卡斯帕·韦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已经将类似这样的竞争战略作为他防务战略的核心。

在冷战接近尾声时，马歇尔已经在探索10年或者20年以后的战略问

题了。正如我们1987年与苏联进行《中导条约》(INF Treaty)谈判那样，马歇尔告诉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美国在未来10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崛起为大国并超过苏联。他宣布，最大的潜在机会来自于精确战争的开始，这到了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军事革命”。他而后将这场新的革命归类为精确打击战争，它如今已经重塑了我们的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

近年来，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期间，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明确指出，美国的对手们正在发展如今被广泛称作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对美国的力量投送形成挑战。他还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采取新的作战概念，例如空海一体战，以应对此威胁。

正如这本书所呈现的，马歇尔的故事说明，尽管五角大楼的许多日常工作都被新闻界日复一日地报道评论（这一点也能够理解），但始终需要马歇尔在他小小的办公室所创造的这些努力。他的办公室得到的资助甚少，却承担着进行创新性思考的重任，并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我们这些曾经与马歇尔共事的人都受益于他的智慧和见解，这已经在我们近些年的历史当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多次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现在正在迈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净评估办公室所作的贡献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于高级防务官员是亟须的。

罗伯特·盖茨 (Robert Gates)

(美国第22任国防部长)

自序

xiii

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给安德鲁·马歇尔树碑立传，而是旨在介绍他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窗口，帮助他们了解马歇尔是如何思考和评估美国面临的长期军事竞争的。尽管他开发的净评估方法最初主要以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的竞赛为重点，但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造的这一概念框架也被证明是思考不同领域问题的有效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伴随着精确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出现而兴起的军事革命、中国的崛起、核武器的扩散。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马歇尔领衔的净评估办公室都力图向国防部长以及其他国家安全高层决策者预先提醒，引导他们关注新兴的战略问题和出现的机遇，从而赢得针对美国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

我们力求不带偏见、公正客观地描述马歇尔漫长的思想历程。这一历程从大萧条时期的底特律开始，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涵盖了战后40余年其担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时光。当然，我们二人谁都不敢宣称自己是完全公正的旁观者。我们俩都曾与马歇尔长期共事。沃茨曾先后于1978—1981年和1985—1996年供职于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克雷佩尼维奇于1989—1993年也在该办公室工作过。从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去职之后，我们二人都退出了现役，但又都继续在安全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完全离开马歇尔的圈子。多年来，我们参与了马歇尔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涉及众多议题。同时，作为战略和预算评估

xiv 中心（该中心为净评估办公室提供咨询支持服务）的成员，我们二人都参与过由净评估办公室资助的许多项目。此外，马歇尔信任的前净评估人员和外围防务专家形成了一个人称“圣安德鲁预备学校”（St. Andrew's Prep）的小圈子，一旦成为其中一员，身份将终身相伴。

跟所有作者一样，我们与读者分享故事的能力受到分析能力和文学功底不足的限制。同时，由于马歇尔的许多思想成果目前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我们在写作中也受到一些制约。因此，未来的数十年时间里，在所有文件解密之前，马歇尔完整的思想史将不可能为人所知。但话虽这么说，我们仍坚信即便存在这些限制因素，马歇尔的经历仍值得一书。至于讲述得是否成功，我们希望留给读者来评判。

如果没有众多人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写作不可能完成。在这些人中，首要的自然是马歇尔本人，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一系列采访，在面对本书手稿即将完工时出现的一些具体的疑问时，他及时而和蔼地给予了解答。我们还要感谢库尔特·古西（Kurt Guthe），大约20年前他曾经就马歇尔的个人生活和净评估工作进行过一系列的录音采访，这些采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渠道，借此可以深入了解马歇尔的人生经历以及他70余年的思想发展历程。这些采访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慷慨赞助、在德文·克洛斯（Devon Cross）和马林·斯特梅奇（Marin Strmecki）的帮助下完成的。我们还要感谢“圣安德鲁预备学校”的许多成员，他们欣然分享了自己得到马歇尔教诲指点的经历。

我们要向我们的文稿代理人埃里克·卢普弗（Eric Lupfer）表示感谢，他帮助我们构思主题，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础，并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我们的编辑阿历克斯·利特菲尔德（Alex Littlefield）和蒂姆·巴特勒（Tim Bartlett）对我们既鼓励又督促，并用他们敏锐的编辑眼光告诉我们如何让本书更具价值。编辑助理伊丽莎白·丹纳（Elizabeth Dana）和项目编辑蕾切尔·金（Rachael King）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她们对文稿的审定和对事实的核实把关使得手稿大为改观。当然，本书中目前还存在的所有事实或者文法错误均由我们自己负责，这一点责无旁贷。

1973年10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从那时算起，有90多名军官和地方分析人员曾在他手下供职。在净评估办公室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情报界、学术界、军界，以及各种不同的智库的分析师和学者，他们也对净评估的开发和实施作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在本书写作过程之中，我们早就意识到，受篇幅所限，书中只能涉及其中的部分人物和内容。

在这里对书名的选择做个简要说明。正如读者所见，马歇尔从来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武士，尽管他曾是美国“民主兵工厂”中的一名“战士”，也是一个“冷战斗士”。但他更像是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所描述的“最伟大一代”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一代人成长于大萧条年代，年纪轻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勇敢地面对与苏联之间“漫长的冷战”。在我们看来，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具有迎接挑战的决心，不是因为这些挑战很容易，而恰是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因为它们很难”。正因为马歇尔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中最后一个在政府高层供职的人，我们将本书命名为《最后的武士》恰如其分。

最后，写作本书过程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不是作者，尽管他们大部分写作和编辑工作都是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来完成的。他们的妻子才是付出牺牲最多的。在我们二人醉心于写作本书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更为优秀的另一半——朱莉娅·克雷佩尼维奇（Julia Krepinevich）和奥佩·沃茨（Hope Watts），我们要报以深深的感激，并奉上我们的爱意。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
巴里·沃茨（Barry D. Watts）

目 录

丛书序言	I
序	罗伯特·盖茨 7
自 序	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巴里·沃茨 11
引 言	1
第1章 一个自学成才的人（1921—1949年）	7
第2章 早期兰德岁月（1949—1960年）	22
第3章 寻找更好的分析方法（1961—1969年）	64
第4章 净评估方法的诞生（1969—1973年）	89
第5章 进入五角大楼（1973—1975年）	115
第6章 净评估的成熟（1976—1980年）	144
第7章 冷战的最后竞争（1981—1991年）	180
第8章 军事革命（1991—2000年）	224
第9章 重返亚太地区（2001—2014年）	264
结 语	286
缩略语	306
索 引	311

引言

在五角大楼第三层的最内环（或称“A”环），第九和第十走廊的连接处，就是“净评估办公室”的唯一入口。办公室大门上标有“3A932”，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点，朝向五角大楼的中心庭院。在冷战期间，这个庭院被起了个绰号，叫“地面零点”，因为人们认为苏联的核导弹正好瞄准了位于庭院中心的快餐部。

A环是这座五层、五角形建筑的五个同心环形其中的一环。大多数高级防务官员的办公室，包括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都位于该建筑的最外面（或称“E”环），被认为是五角大楼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尽管A环和E环之间是隔开的，但从国防部长位于E环的套房经过第九走廊来到3A932，也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距离近很重要，因为3A932是国防部长自己的私人智库。

要进入3A932，来访者必须按下办公室大门旁边的按钮进行通报。之后电铃响起，表示开锁，沉重的门开启，就可进入办公室了。即使在五角大楼内部，这样的安保措施也是必要的，因为办公室储存着高度涉密的资料。用五角大楼的行话，就是敏感性隔离信息设施（*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或者叫“SCIF”（英文发“skiff”的音）。

可能有的来访者期待看到类似好莱坞电影中的场景。但一旦进入办公室内部，他们可能就感到失望了。没有电子设备。人们并没有在匆忙工

作。相反，在左边是年轻工作人员的小卧室，还有一些小的办公室。在靠里的右侧是一间会议室。其陈设让人感觉像是来到了折扣大卖场。

在近些的右侧是一个大办公室就是主任的办公室，大约30英尺长20英尺宽。进去之后，右边是堆满书的几个书架，左边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xviii} 足够4到5个人宽松坐下，但是只有几把椅子。原因是办公室的桌子和其他大部分平面空间都另作他用，高高地堆放着学术论文和书籍，涉及话题非常广泛，包括考古、核武器、人口学、认知科学等。许多资料都是作者本人送来的，希望主任能够阅读，甚至可能给出意见。

主任办公室中有一张书桌；和会议桌一样，上面也堆满了书和论文。旁边有两个用旧的皮质扶手椅。其中一张的扶手上面堆放着一摞不太高的文件，而座位上放着更高的一摞论文。在这张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还有另外一摞书和论文。椅子上坐的人可能会把脚搭在这堆文件上。

在另一张椅子上，大多数时间都坐着一位90多岁的老人，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他接近六英尺高，可能只差几个英寸，秃顶，只在两边和脑后有一圈灰发。他主要的特征就是他较大的鹰钩鼻，而且从来都戴着一副稍显过时的金属边眼镜。在镜片的后面，一对醒目的蓝眼睛炯炯有神。他说话声音柔和，并且不愿多说。但一旦开始讲话，他惯有的高深莫测的评论总是直达问题的核心。

他的名字叫安德鲁·马歇尔。从冷战之初开始，他就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资深战略思想家之一。

如今，在马歇尔进入他的公共服务生涯的第七个十年时，他被称为“世界末日的巫师”，他的思想成就堪比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等核战略家。在冷战期间和之后的时期，这些人的深刻见解影响了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决策。他能够成为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家，其思想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